



绍兴文史资料

第一辑

yt166/04

绍兴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前 言

绍兴自昔是人文荟萃之邦。近百年来，绍兴出过不少革命志士、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教育家，以及许多爱国爱乡、在各方面作过不同贡献的知名人士。他们的精神和业绩，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崇敬。在“风雨如磐”的岁月里，绍兴也遭受过蹂躏和苦难，有痛苦的呻吟，也有不屈的斗争和胜利的欢悦。新中国建立后，绍兴焕发了历史文化名城的青春。百年来的沧桑变化，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搜集整理各方面亲见、亲历、亲闻的史实，可以为今后的工作提供资料和借鉴。文史资料还可用以教育子孙后代，是当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之一。一九八三年绍兴市政协第一届委员会成立以来，就着手开展文史资料工作。一年半来，由于各界人士的关心和支持，已征集到一定数量的稿件，现经选择、整理，将其中一部分编成这一《选辑》，付梓出版，呈献给广大读者。

在这个《选辑》的编选过程中，我们尽力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但由于我们的水平不高，知识有限，加以经验缺乏，错误、缺点必然难免，希望读者批

评、指正。又由于我们开展工作时间不长，积累的资料不多，本《选辑》的内容只限于绍兴本地，未能遍及市属各县，我们希望各县同志今后多多提供稿件，以便把我市的文史资料工作向前推进一步。

这个《选辑》的出版，得到浙江省政协文史办公室的指导和协助，谨向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绍兴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六月

目 录

孙中山慰问陶成章家属·····	陶永铭 (1)
周总理在绍兴二三事·····	曹学海 (3)
邵力子先生家世与前期经历·····	朱仲华 (5)
孙德卿、孙庆麟生平事略·····	孙光祖 孙效瑾 (18)
记两个绍兴籍的陈伯平·····	陈觉民 (22)
邵元冲之死	
——西安事变的一个见闻·····	张任天 (25)
爱国人士与民族实业家金汤侯先生·····	谢仰安 (28)
回忆父亲施伯侯先生·····	施亚西 (45)
马世淦与绍兴电话股份有限公司·····	张润民 (50)
绍剧艺人李玉水·····	沈季刚 (57)
解放绍兴城 会师鉴湖畔·····	王克仁 (61)
回忆绍兴沦陷前后·····	高世果 (66)
抗战胜利时绍兴复员经过·····	宋子亢 (76)
绍兴征兵黑幕纪实·····	朱耀庭 (87)
绍兴县参议会内幕·····	胡 铨 (91)
记郑小隐任内的几件事·····	单文吉 (98)

平水珠茶史话	吴佩华 (104)
越窑青瓷	沈作霖 金迪生 (116)
百年老店震元堂	贺贤能 (120)
热诚学校创办始末	陈觉民 (129)
我所知道的浚德女校	谢梧岗 (134)
青藤书屋的历史见闻	陈惟于 (141)
陶浚宣与绍兴东湖	陶馨远 (151)
绍兴平调述略	何信恩 (156)
鉴湖水与百年陈酒	单文吉 (167)
典当与兜会	周冠五 (170)

孙中山慰问陶成章家属

陶 永 铭

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八月中旬，孙中山先生从上海出发南来，到杭州时，就通知绍兴县知事宋承家，由宋差人来陶堰我家告诉我曾祖父陶品三（即陶正），邀请他八月二十号左右（具体日期已遗忘）来绍兴城内谒见孙中山先生。我曾祖父得悉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召见，开始不敢相信，后来本家陶荫轩先生（绍兴县商会会长）也派人来通知，才相信，兴奋得一夜未睡。第二天拂晓，他就从陶堰徒步来城，上午十时，在城内先生下榻的布业会馆相见。孙中山先生一见到我曾祖父，立即起立，热烈握手，首先表示向我全家问好，又关怀地问起我祖父陶成章牺牲后，家庭情况如何，特别提到生活是否能过得去。我曾祖父向孙中山先生汇报了国家发给的抚恤金大部分还了债，一小部分造了几间住房，感谢孙中山先生对烈士家属的关怀。孙中山先生听后，随即叫秘书写一手谕给浙江省都督府，意谓：从民国五年开始，追加陆军上将陶成章烈士年抚恤金七百元正。从此以后，我家生活有了很大好转，直到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南京组成国民党政府后，才下令取消。

接见后的第二天，孙中山先生还邀请我曾祖父一同乘“烟波画舫”前往东湖陶社祭奠陶成章烈士，并摄影留念。（这张照片已于一九六三年赠送给绍兴县文管会保存。）中餐由本家

陶緝民先生招待。餐畢，我曾祖父告別孫中山先生，即返陶堰。孫中山先生當日回城，又到為紀念我祖父而設的学校——成章女校參觀，並在我祖父陶成章遺像前默哀致敬，表示深切悼念。

孫中山先生曾寫“氣壯河山”四字，贈給我曾祖父，表示對烈士的高度評價。（解放初，我們已將這一題詞贈給浙江省博物館保存。）孫中山先生的豐功偉績與他那偉大平易的風格，永遠留在我們烈土後代的心中。

以上史實，是由我祖母、父親、叔父生前相繼告訴我的。

周总理在绍兴二三事

鲁学海

一九三九年三月，杭州已经沦陷，绍兴成为浙江抗战的前线，敌机经常飞来骚扰。正当其时，周总理从皖南巡视浙东，顺道来绍宣传全民一致共同抗日救国的道理。在他的精神鼓舞下，绍兴各界人民无不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增强了抗日的决心。同时，周总理还在百忙中走访亲友，加强各方面的联系。在即将离绍的前一日，曾经访问了我的父亲鲁觉侯先生。当时我家为了避免空袭，住在老家皋埠西甫，因战争影响，沿线公路铁道已彻底破坏。周总理同一位侍从，坐脚踏船直至西甫，专程相访，刚巧我的父亲于同日上午启程前往永康，未曾会面，由我的母亲陪同亲邻招待贵宾。周总理停留我家达半小时之久，他对亲朋好友都一一加以垂询，十分亲切。

第二天，周总理取道枫桥迳赴永康，就问当时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关于鲁觉侯先生的情况，要求会晤叙旧，黄绍竑即饬省粮调会主任朱惠清接待。事又不巧，朱告以鲁觉侯先生刚刚奉派到上饶三战区联系公务去了，因此又没有碰面。周总理留下便笺给我的父亲，大意是，两度相访，缘慳一面，为憾！我就是懋臣公长子。兹因返渝在即，尊驾如有来渝之便，望先期示知，以便迎迓等语。这封信本来保存着的，后在“文革”期间被毁。

一九五〇年一月，周总理委托他的六叔周嵩尧先生出面同我家取得联系，我们之间互赠土特产和交换合家照。解放初期，我从宁波邮汇局精简回家，曾经写信给总理，可否在北京安排工作，后接周嵩尧先生来信，总理婉言回绝了我们的要求。由此可见，周总理处理事务公私分明，令人肃然起敬。

邵力子先生家世与前期经历

朱 仲 华

邵力子先生是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义学说的宣传者和执行者之一，也是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创始者之一，又对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宣传作出过不小贡献，是国共两党两次团结合作的积极参加者，故有“和平老人”之誉。

我从一九一三年三月一日进上海复旦公学附中起，到一九二〇年夏毕业于复旦大学文学系，先后受教于邵先生达八年之久。毕业后又长期受到先生的教诲。解放后，先生又引导我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大道。当绍兴解放不久，我就收到先生从北京拍来的电报，内容是：“闻吾邑解放，希尽力协助”。我怀着兴奋喜悦之情，积极地向绍兴军事管制委员会联系，尽力之所及，做应做之事。回忆师生交往，长达五十年之久，追念先生，铭感肺腑，现就所知，记述如下。

先生籍绍兴陶家堰邵家溇。一八八二年十二月七日（清光绪八年壬午十月廿七日）诞生于陶家堰鉴记米行屋后之邵氏旧居。太先生邵霜，字诚斋，又字实斋。元配章氏，绍兴人。继室张氏，江苏吴江县盛泽镇人。先生兄弟二人，均系张夫人所出。其长兄闻益，字伯谦，据先生自传所载：“我母（张氏）只育两子，我初名景奎，字仲辉，取义奎璧联辉。进校时改名闻泰。任《民立报》编辑时，笔名力子，取义于《后汉书》‘游子天所弃，力子天所富’。游子谓游惰之人，力子谓勤劳之人。其后

取消名号，即用力子为名。我十六岁以前，在家塾读书。清廷废八股，办学堂，我离私塾。十七岁受戊戌维新影响，始至上海入学校，初入严开第所办求志学堂，一年后，该校停办，曾考入广方言馆，始学法文。不久又考入苏州中西大学堂，即江苏高等学堂”。

一八九七年，先生之父病逝于苏州，从此家庭生活由其叔莲坡负担。

一九〇二年，叔莲坡为先生捐了“监生”，并即嘱赴杭废举。遂于光绪廿八年庚子、壬寅并科中第六十七名举人，署邵闻泰，时年二十一岁。乡试中后，按规定时间应进京殿试，即参加进士考试。先生却悖叔之意，卒未成行。

时江苏臬台朱智，邀先生去任文案。先生以清廷腐败，辞而未就。遂去上海，入南洋公学“特班”求学。同年十月间，南洋公学学生因误置墨水瓶于课桌上，为教师所责，引起罢课风潮，因此先生退学，去浙江吴兴南浔镇执教。

一九〇三年先生二十二岁，由世交同学陈紫仪、谢祥霖为媒，与绍兴平水人屠玉瑛（1886—1919）结婚于旧宅。婚后，携眷同去吴江县盛泽镇外婆家。妻舅屠长春，后从外祖姓，改为王长春。美国史学家包华德所作邵力子小传，误写“原配王氏”，或系此因。夫人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在沪去世。直至一九三一年二月一日，先生才与江苏宜兴傅学文女士在南京结婚。

先生曾在一九〇四年二月五日发刊的《俄事警闻》第五十三号上，发表题为《俄祸》的征文稿，署名仲辉。文中认为“此非我中国之祸，而为全世界之祸”，主张我同胞应“挺力而起”。这是先生青年时代的反帝例证。同年，先生去震旦求学，结识了于右任先生，从此结为莫逆之交。

一九〇五年夏，震旦公学受法天主教干涉，不许学生学汉文，只限读法文，并规定学生必做礼拜，引起学生不满。当时于右任和先生组织同学罢课，得到马相伯校长支持，马校长带领学生离开震旦公学，于当年中秋后一日，到吴淞炮台湾自行办学，取《尚书大传·虞夏传》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意，命名为“复旦公学”，即今日复旦大学前身。先生等并首创“学生自治”。

一九〇六年秋，先生东渡日本，旋即加入同盟会，曾亲聆中山先生面教。此后先生一直追随中山先生，由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到中国国民党，从辛亥革命、反袁斗争、护法运动到国共首次合作，故被称国民党元老。

先生与于右任在日本读书时，为了宣传同盟会政纲，筹办《神州日报》，曾向留日同乡学生，如陶家堰的陶成章、陶冶公，东浦的陈子英，绍城的周树人、周作人，赵家堰的许寿裳等，募集二千余元。回国后，于一九〇七年四月二日在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老巡捕房对面辰字五八二号，以于右任为经理，创办了日出对开四大张的《神州日报》。孙中山先生曾函示要求把它办成革命的机关报。马相伯曾为题词曰：“以热心毅力鼓舞国民，恢复我神州二万余里之权利，完成我神州四万万兆同胞之责任，扫除三代以降小康之事业，而跻斯世于大同之景运。”南通张謇亲为题写报眉。

《神州日报》创刊后，利用租界，积极巧妙地宣传同盟会的政治主张和进行革命活动。如曾报导“广州潮州黄岗之役”。当徐锡麟殉难后，该报将两江总督端方为此事给租界当局“革命党人多匿迹租界，嗣后有剿捕事宜，不得干涉”的照会发表，借以通报革命党人，注意活动，以防不测。另一方面，先生以“景墨”笔名，发表《皖警》一文，以“一士披猖海岳

惊”的诗句，悼念并推崇徐锡麟等烈士。这年夏，祥兴琴行起火，焚及《神州日报》社。但越日，就在望平街借屋，委托商务印书馆代印出报。后因经费困难，先生由于右任先生介绍，去陕西高等学校任教。因宣传新思想，被陕西当局驱逐出境。

一九〇九年五月十五日，先生又追随之于右任先生筹备创刊《民呼日报》于上海宝安里，以“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为宗旨。创刊《宣言书》中说：“《民呼日报》者，炎黄子孙之人权宣言书也。”因揭露河南矿案卖国罪行，刊载《因粤汉铁路借款问题责卖国误国之臣民》等文，触怒当局，于右任先生被诬而遭捕入狱，《民呼日报》乃作抗议性停刊。于右任先生获释后，先生又追随之先生，一九〇九年十月十三日，创刊《民吁日报》，发行不过月余，又于十一月二十日被查封。

一年后，同盟会在斗争中进一步发展壮大，先生又协助于先生于一九一〇年十月十一日创刊了《民立报》，以《中国万岁！民立万岁！》为创刊词，社址在上海西路望平街，辛亥革命后，迁河南路三芳阁桥五十四号。

《民立报》由同盟会员宋教仁（笔名渔父）、叶楚傖（小凤）、章士钊（行严）、杨骥（千里）、吕志伊、徐血儿及先生等一同编辑，阵容坚强。渔父以尖锐笔锋，发表社论，揭露清廷积弊，深受读者欢迎。先生任上海本埠新闻编辑，开始以“力子”为笔名，撰写短评，犀利如剑。徐血儿所撰小品文，亦具特色。

从《民呼》到《民吁》到《民立》，相继为鼓吹革命作贡献，当时有“三民报”的美称。先生曾亲口对我说过：“我们‘呼’之不成则‘吁’，‘吁’之不准则‘立’！”

武昌起义，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自南洋回上海。十一月四

日《民立报》上刊出了上海光复的报导后，十一月十一日又刊出了《绍兴士民之义勇》的报导，说：“开元寺主僧巍峰（开元寺，今绍兴市东街五六一号第一医院所在地，巍峰和尚名铁崖，系光复会员）组织卅字军，弃佛从戎，要请光复军总理浙江参谋长陶卿公（即陶成章）调赴北伐，陶已派代表赵汉卿到绍兴犒赏。”十一月十八日，先生在报上就大力宣传了陶成章，说陶“秉性刚毅，不屈他族，立志推翻满清，恢复旧物。为人诚实，以俭自奉，以厚待人，故一般英雄豪杰，争趋附焉”。

同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理化部主任杜亚泉（绍兴伦塘乡人）发起组织“绍兴旅沪同乡会”，先生被选为副议长（议长杜亚泉）。此后，先生即在上海爱尔琴路负责筹办“绍兴七邑旅沪公学”，任校董。

十二月二日，由光复会军旧部为主所组成的浙江联军攻克金陵，东南各省光复，局势底定。十二月十八日南北和议在上海举行。二十四日《民立报》上发表了同盟会关于“元凶尚在，中夏未清”，应“长驱河朔”以“建立民国”的宣言。当时孙中山先生已到达上海，先生参加了前往欢迎的行列。十二月廿九日，孙中山先生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沪军都督陈其美密派当时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的王金发担任保卫工作，护送孙先生去南京就任。陈其美曾面对邵先生说：“我们革命党人惯用暗杀手段对付清政府的显要权贵，也要防止他们用暗杀手段来伤害中山先生。有王金发担任秘密保卫工作，就可以放心了。”

一九一二年一月初，柳亚子到上海任《民声报》社的主笔，先生应邀兼任该报记者。一月十一日，在上海的同盟会骨干，在汇中旅馆欢宴自宁来沪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邵先

生也在座，并见到了王金发。当时，孙大总统已下令浙江都督汤寿潜出任交通总长，浙督无人，要求陶成章继任浙督的呼声甚高。而陶适进广慈医院养病，委托先生在《民立报》上发表《陶成章致各报馆转浙江各界》的声明，辞谢出任浙督，并推荐蒋尊簋。

一月十四日，邵师应永康县沈荣卿等之请，刊载“荣等已号召旧部，听先生指挥”的《致陶成章》电，推陶继任浙督。不料翌日凌晨二时，陶成章遇害。《民立报》即于当日刊出《陶完三死不瞑目》的新闻。一月二十一日，沪督府与绍兴旅沪同乡会在会所斜桥永锡堂，联合举行了徐、陈、马、陶追悼大会，先生亦蒞会，并于次日发布报道。

一九一二年八月，各省军政府统一改组，王金发离绍到上海，为纪念秋瑾、徐寄尘等，创设竞雄女学于上海白克路（今黄河路），先生应聘任教职。

八月十二日，宋教仁等发起把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共和实进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等合组为“国民党”，推中山先生为理事长。先生亦由此转为国民党员。

一九一三年三月一日下午，复旦公学在上海徐家汇“李（鸿章）公祠”复校，举行开学典礼，先生与校长李登辉、副校长王宠惠等同登主席台，此后就一直在复旦兼课，任文学系丁、戊班（多属华侨子弟）国文教师，由于先生口齿清俐，语言精辟，别班同学多爱前来插班听课。先生曾选用《战国策》、《古文辞类纂序》等古文及《民立报》上文章如《国会议员孙洪伊致冯国璋通电》等作为国文教材，倍受同学欢迎。一九一七年三月，复旦改大学，先生与伍廷芳、王宠惠、唐绍仪、萨镇冰等同任校董，并任中文系主任。

三月二十日，袁世凯密令内阁总理赵秉钧派应桂馨、洪述

祖暗杀宋教仁于沪宁车站。先生不胜愤慨，在《民立报》上署名“力子”，连续发表《纵容杀人之政府，国人奈何纵容之》、《宋先生不死》、《当与国人共弃之》、《何以慰宋先生在天之灵》、《自由不死》、《咄咄怪事》等尖锐短评，对北洋政府予以无情谴责。此后并与徐血儿、叶楚伦、杨千里、宋宗良合编《宋教仁文集》，以资纪念。

五日后，中山先生自日本赶回上海，召集国民党骨干举行紧急会议，先生亦与会，会上决定五省（广东、湖南、江西、福建、安徽）都督起兵讨袁。《民立报》积极响应，先后发表中山先生的《讨袁檄文》和中山先生的“二次革命”主张等。

九月间，“二次革命”不幸失败，袁世凯疯狂下令严禁革命党人活动，《民立报》于九月四日被迫停刊。

一九一四年七月八日，中山先生在日本筑地精养轩重组“中华革命党”，任总理，宣布“以扫除专制政治，建立完全民国为目的”，力主反袁。先生与陈其美、于右任等积极响应，为上海党部重要成员。

一九一五年冬，上海党部发起筹办以反袁为目标的《民国日报》，由于右任取名并题写报头，馆址设在上海天主堂街（今金陵东路）五十九号。为避免北洋政府干涉，向日本领事馆注册，以利发行。日出三大张的《民国日报》作为中华革命党的秘密机关报，于一九一六年一月廿二日创刊。由叶楚伦任总编，先生任报社经理，兼编本埠新闻。

在二月十一日，本埠新闻版刊先生短评《呜呼洪宪》，说：“皇冠未戴，年号已颁，彼盖以‘洪宪’二字，迫人为承认帝制之表示，且对于不承认者，得皇加干涉，其用心盖自谓至巧。不意因此二字，闹出许多笑话，对外则公文被退回，对内则一再

强压，反见得内外人心都不肯承认帝制，弄巧成拙。”

五月九日，在刊载《袁家军奸污蚕妇》这一报导的同时，又刊出了中山先生自日本回国在上海亲手交与先生发表的《第二次讨袁宣言》，揭露袁世凯所谓“停战议和”的险恶用心，公开号召“除恶务尽”，指出“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伐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

五月十八日，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中山先生曾面对邵先生说：“天地不仁，歼我良士。”深为痛惜。

六月六日袁世凯死亡，次日《民国日报》上发表了《袁世凯一命呜呼》的专电，同时刊出了注上“恶贯满盈之袁世凯”字样的袁头照片，及《袁世凯死后之时局》的社论。六月九日，又及时刊出《孙文宣言》，要求继任总统的黎元洪“复约法，召国会”。此后，力子先生又追随中山先生，为“护法”而进行宣传斗争。

一九一七年七月，张勋在北京抬出年仅十二岁的溥仪，宣布“复辟”，改年号为“宣统”九年，竟通电全国改挂龙旗。七月四日的上海《民国日报》，当即刊出声讨张勋复辟的通电，除康有为主办的《国是报》外，各报群起响应。先生于七月六日发表《吾为此惧》，后又发表《讨贼宜亟》等时评，在七月廿日头版头条发表孙先生的演说词。同时报导中山先生南下广州，揭露了段祺瑞讨伐张勋是假，乘机夺权是真的大阴谋，正确指出，今后革命党人与北洋军阀是“真共和与假共和”的斗争。

一九一九年五月六日，上海各报发表了北京发生“五四”运动的专电。当天清晨，先生亲自带报来复旦找我，当时我任复旦学生会主席，先生要我紧急集合全校学生。先生当场读完